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产业与就业的深度融合和协同发展,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然要求。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落实好产业、就业等帮扶政策,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将“提升产业和就业帮扶实效”作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着力构建乡村产业就业协同的长效机制,形成产业兴旺、就业稳定、收入增长的发展格局,能够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夯实根基。

党的自我革命重在治权

□赵翌

[深刻认识“治权”的重要意义]

从政治高度清醒认识“为什么要治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腐败的本质是权力滥用。这一重要论断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腐败问题产生的根源,深刻阐释了强调“治权”这一重要命题所蕴含的深邃思考。纵观中外历史,许多政权的腐败衰败,其内部原因往往在于权力的失序、失控、失衡。以史为鉴,在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全国胜利之前,我们就在深入思考将来如何长期执政的问题。在著名的延安“窑洞对”中,当黄炎培先生发问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时,毛泽东同志给出的第一个答案——“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中便体现了我们党深刻的“治权”思想,强调了对外部制约和监督。新时代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总结反腐败斗争的经验、规律,更加深刻认识到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关键是要防止执政党变质、变色、变味,关键在于党的自我革命,并将自我革命作为我们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党的自我革命着眼于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将“治权”思想融入党的建设。“两个答案”一以贯之、辩证统一,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推动权力规范运行进一步到位。

从党的性质宗旨深刻理解“为什么能治权”。如何看待权力来源、如何正确使用

[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键制度笼子]

治权,要靠制度加强对权力的约束。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将制度建设摆在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党的二十大专门就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作出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202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汇报,研究部署“十五五”开局之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明确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切实增强制度执行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要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制度治权,关键是要通过制度建设推动权力配置分工科学、权责明晰,通过制度约束确保权力在正确的轨道上规范运行,通过有力有效地执行制度维护制度的生命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必须强化制度建设,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寻租空间。“十五五”时期,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推动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围绕授权、用权、制权等环节,合理确定权力归属,划清权力边界、厘清权力清单,扎紧、建好制度之笼。紧盯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严肃开展监督执纪执法,及时纠正权力滥用问题,推动有关单位深化整改整治,以案促改促治,全流程、全方位梳理排查风险隐患,在完善建章立制上下更大功夫,堵塞制度漏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既要不断完善制度规定,使制度密而不繁、有效管用,又要着力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要坚决防止制度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避免制度条文过于笼统、流于形式。健全保障制度落实的有效机制,

[推动将“治权”要求融入高校全面从严治党]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系统安排,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的高度重视。中管高校作为建设教育强国的“第一方阵”,承担着育人、为国育才的重大使命,肩负着引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时代重任,承载着千家万户的期待厚望,务必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反腐败斗争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坚决破除“高校特殊论”,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高等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自十八届中央对清华大学等中管高校开展专项治理以来,特别是十九届中央巡视中管高校后,中管高校党委管党治党责任意识不断增强,深化中管高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取得初步成效,但近年来中管高校发生的违纪违法案件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案件,充分印证了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复杂严峻,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

权力,是检验一个政党性质宗旨的试金石。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正式发表。马克思、恩格斯庄严宣告,“无产阶级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秉持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共产党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境界与情怀,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不谋私利就有了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就能谋根本、谋大利,就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检视自身、常思己过;不讳疾忌医、不文过饰非,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就能有力回击一切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这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奥秘所在,也是我们党能够推进自我革命的底气所在。也正是在因为不谋私利,我们党才能有无私无畏、下决心“治权”的勇气和毅力。纪检监察机关要带头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的重要论述,旗帜鲜明与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督促党员干部在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保持头脑清醒、立场坚定。

定期对制度的时效性、执行情况开展检查、评估、考核,及时纠正执行偏差等问题。

治权,要加强对行使权力者的监督。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少数”,掌握着定政策、作决策、抓落实等各项权力,在重大事项、人事任用、资源配置等方面拥有较大话语权、决策权,一旦失去有效监督和约束,各项制度在权力的影响下很容易变成虚张声势的“稻草人”,只照别人的“手电筒”、任意拉扯的“橡皮筋”。因此,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一把手”必须带头敬畏制度、执行制度、维护制度,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树牢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自觉接受组织和人民的监督。纪检监察机关要把加强对“关键少数”的监督作为政治监督重点任务,推动领导干部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做到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认识进一步到位,深刻认识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是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任务,站在政治的高度,将严格执行制度作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检验,不断增强制度意识,善于在制度的轨道上推进各项事业。推动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强化宗旨意识,始终牢记党员干部手中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真正把心思和精力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决不能把权力变成个人或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确保制度规定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督促健全对不当用权等问题的追责问责机制,督促领导干部严于律己、正其身、严其所辖,规范履职用权,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责要问责、违法要追究。

招生招考、基建工程等重点领域仍然存在廉洁风险,风腐一体、风腐交织问题时有发生。这些问题暴露出高校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够健全,制度建设还存在短板,充分表明高校领域制度“治权”势在必行。中管高校党委、纪检监察机构必须深刻认识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强身健体的自觉行动,是为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更好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坚决落实“五个进一步到位”的重要要求,以更加鲜明的态度、更加勇毅的决心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紧盯重大政策制定、重大工程审批、大额资金安排、干部选拔任用等重要事项,健全授权用权制权相统一、清晰透明可追溯的制度机制,着力督促党员干部增强党性、遵规守纪,维护风清气正的校园政治生态,做到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

作者:赵翌,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国家监察驻清华大学监察专员(据《中国纪检监察杂志》)

[产业就业协同发展的内在逻辑]

产业就业协同发展,是指依托区域资源禀赋和劳动力结构,通过产业结构优化、技能匹配升级、制度保障完善等途径,使产业创造的就业岗位质量、数量与劳动力的技能水平、职业发展需求相适配,从而实现产业竞争力提升与居民收入增长同步推进的发展模式。这种协同并非简单的产业规模扩张或就业数量增加,而是通过构建“产业—就业”的良性循环机制,推动产业兴旺为大就业创造物质基础,就业稳定为产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本,二者相互依存、协同赋能,共同构筑驱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引擎。

产业就业协同发展主要强调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的匹配。关键在于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将特色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这种产业竞争优势能够最大限度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业竞争力,同时为本地劳动力提供符合其技能特点的就业岗位,实现资源、产业与劳动力的精准匹配。二是技能培训与

[产业就业协同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关系]

产业就业协同发展影响着乡村振兴的各个维度,这种影响并非单一线性的,而是通过复杂的互动网络产生乘数效应,最终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产业就业的有效协同,既能够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物质基础,又可以改善乡村社会关系,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的关键路径。

产业重构与价值共创是推动产业兴旺的内在动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影响产业振兴直接体现在乡村产业的现代化转型上。一方面,通过产业就业协同发展,乡村产业逐步向规模化、集约化、品牌化方向发展,形成一二三产联动、多元价值共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不仅可以挖掘和开发农业的多种功能,延长产业链条,而且可以创造多元化、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带动农民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另一方面,产业就业协同发展可以促进乡村产业集群的形成。当特定产业在某一区域形成规模效应,会吸引相关配套企业和服务机构集聚。这种集群效应不仅可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还能为农村劳动力提供更多就业选择和职业发展空间,形成“产业吸引就业—就业支撑产业”的发展格局。

绿色发展与人居环境改善是实现生态宜居的核心要义,产业就业协同发展对乡村生态环境的影响呈现双重特征,既可能因产业发展带来环境压力,也可能通过绿色转型促进生态保护,关键在于发展模式的选择和价值导向的确立。实践证明,立足乡村生态资源禀赋,发展乡村绿色产业,能够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相统一。绿色产业不仅能够创造就业机会,还能够保护乡村生态环境,增强可持续发展内生动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通过促进农村劳动力本地化就业,可以缓解乡村“空心化”带来的人居环境退化问题。当农民能够在家门口获得稳定收入,就会更加重视和投入乡村环境建设。这种“产业

[推动乡村产业就业协同发展的主要路径]

强化规划引领与政策协同,完善顶层设计框架体系。县级层面,明确重点发展的主导产业、空间布局和就业目标,避免各乡镇同质化竞争;乡镇层面,立足资源禀赋,确定具体产业、村落后,推行“一村一策”,聚焦打造比较优势,形成错位发展、功能互补的县域产业生态圈。此外,创新“产业—就业”一体化政策工具箱,有效整合产业扶持政策与就业促进政策。将新增就业岗位数量、员工薪资增长水平作为评价乡村产业项目(包括帮扶产业项目)成效、分配产业衔接资金的核心指标之一,形成“以产促就、以就稳产”的政策导向。

培育特色优势产业与产业集群,打造稳定就业的核心引擎。做好“土特产”文章,打造地标性产业链。深入挖掘并科学规划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手工艺品、生态文化资源,推动其与“原材料产出”向“全产业链”延伸。支持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拓展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在此过程中创造更多研发等高质量就业岗位。打造区域公用品牌,以品牌溢价带动整个产业链上的农户

□顾阳

年货清单的变化、出行方式的多元选择,以及众多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涌现的背后,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具象表达,也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与潜力的集中展示,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观察中国城乡经济融合发展的窗口。春节临近,广州迎春花市陆续开市,黑龙江冰雪嘉年华游客如织,上海豫园新春灯会即将点燃……伴随着“最长春节假期”与马年新春的相遇,全国各地已“年味”渐浓,一幅热气腾腾的“年经济”画卷正在华夏大地展开。春节,不只是一个古老且极具生命力的节日,也是最能带动社会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节日,特别是今年春节假期的延长,更为传统春节消费注入了新动能,让“年经济”彰显其独特文化与经济双重属性的同时,不断塑造出新的消费图景。在物质丰盈的今天,春节消费正从“满足基本需求”向“追求品质体验”升级。京东等各大电商平台数据显示,有机会材等已成为新春消费购物车里的新宠。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冰雪旅游等,也以各具特色的文旅新品,持续丰富着广大民众的节日选择。

对于消费者来说,假期的拉长意味着消费节奏的放缓、消费空间的拓展,人们可以更加从容地把抢购年货的紧迫感转向对年货品质的甄选,将短促的走亲访友转化为更加悠闲的短途旅行和深度体验。无论是家庭团圆还是“轻旅游”“微度假”,文旅融合的消费潜力有望得到更好释放。数字时代的春节,消费形态也在悄然变革。直播间里主播们身着红衣推荐各地

人力资本提升。产业做大做强必然要求劳动力素质提升,而人力资本积累又会反过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这种“产业需求引导专业技能培训—人力资本提升促进就业—就业稳定支撑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能够有效破解人力资源开发与产业需求脱节的困境。三是组织创新与利益联结。现代化产业通过组织创新,构建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可以实现产业收益的合理分配。这类组织创新打破了传统产业的封闭性,构建起多元主体共生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数字技术打破了地理空间限制,能够重构产业形态和就业模式,不仅创造了新型就业岗位,还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了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产业就业协同发展的内在逻辑深刻体现了系统思维与辩证思维。产业是就业的载体,就业是产业的支撑。只有把握这种内在关联,才能避免就产业谈产业或就就业谈就业的片面性,激活发展的内生动力。这种协同发展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技术进步、市场变化和制度创新不断演进的过程,需要政府、企业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协同推进。

发展—就业稳定—社区认同—环境改善”的传导机制,是产业就业协同发展促进生态宜居的重要途径。

文化传承与社区认同是推动乡风文明的重要内容,产业就业协同发展对乡风文明建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化价值重塑和社区认同强化两个方面。传统乡村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传承断层和价值冲击,而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为乡村文化传承提供了新的表达形式和传播载体。这种“产业+文化”的发展模式,使乡村文化从单纯的保护对象转变为可生产、可消费、可传承的活态资源,进而增强农村居民的文化自信和认同感。产业就业协同发展也成为乡村青年劳动力提供了发展平台,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创业,从而缓解人才外流导致的乡村文化断层,为乡风文明建设注入新鲜血液和创新活力。

主体重构与利益联结是夯实乡村治理有效的组织基础,产业就业协同发展通过改变乡村社会的组织形态与利益格局,能够为“治理有效”奠定坚实组织基础。传统的乡村治理结构相对单一,主要以村两委为主体。在产业就业协同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农村合作社、共富工坊等经济组织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主角,同时也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另一方面,产业发展与农村劳动力就业、村集体收入形成紧密捆绑,村民、村集体等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这种深度的利益联结极大地激发了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

收入多元与保障稳固是农民生活富裕的物质根基,产业就业协同发展直接体现在农民收入的提升和收入结构的优化上,这是实现生活富裕最坚实的物质基础。产业就业协同发展打破了农民收入依赖传统农业“靠天吃饭”的单一格局,实现了收入的多元化和稳定性。稳定的就业是防止低收入群体返贫的最有效防火墙。产业就业协同发展有助于建立长效的“造血”机制,增强低收入家庭抵御经济风险、市场波动和意外变故的能力。

增收。引导产业集聚与推进数字化转型。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向产地下沉、向园区集中,发挥产业集群效应,降低物流成本,吸引配套企业集聚,扩大就业容量。大力实施“数商兴农”,支持直播电商、社区团购等新业态发展,培育“乡村主播”“数字新农人”等新型职业,通过数字经济打破地域限制,实现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发展。

实施精准技能培训与人才引进,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一方面,建立“企业订单、培训附构出菜单、政府来买单”的培训机制。定期开展企业用工需求调查,根据产业规划和企业需要,动态调整优化培训内容,大力开展与乡村主导产业相关的“订单式”培训,确保培训后能上岗。另一方面,实施“内外并举”的人才策略。大力培育本土致富带头人、乡村工匠、高素质农民,发挥其“领头雁”作用;多方引智,实施“归雁工程”,吸引大学生、外出务工人员、退役军人等返乡创业就业。

作者:王轶、刘蕾,分别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博士后

(据《光明日报》)

“年经济”折射消费韧性活力

特色年货,社交平台上电子红包等频频刷屏,本地生活服务APP年夜饭套餐、家政服务预订火爆,让线上线下的消费边界逐渐模糊,一个互补共生的春节消费生态正加快形成。

事实上,年货清单的变化、出行方式的多元选择,以及众多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涌现的背后,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具象表达,也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与潜力的集中展示。不仅如此,这场全民参与的“年经济”,更多时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观察中国城乡经济互动与融合发展的窗口。正如学者们所描述的那样,春节假期这场亿万人的“大迁徙”,也是财富与消费观念的一次交融,“大规模、自发性的双向奔赴,无形中已成为转动消费市场齿轮的‘润滑剂’,让内循环的毛细血管更为通畅,为更均衡的区域发展注入活力”。在时空的跨越中,传统年味经历了一次次创造性转化,年味的传承并未在传统中失去市场,反而融入了更多的现代生活方式与审美元素,由此焕发出新的生机。不过,在“年经济”红火火的背后,我们也需保留一份理性与冷静。透过“年经济”,我们既要看到传统节日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商业力量,也不能让过度商业化充斥“年经济”,尤其是当越来越多人“年味”可以通过包装或策划得以呈现时,“年经济”很可能沦为单纯的吃喝娱乐消费。也就是说,“年经济”必须超越冷冰冰的交易,只有让它根植于人们对团圆、亲情等文化的认同中,根植于中国人情感结构、文化传统与经济行为的深度共鸣中,才能让我们的消费更接地气、更可持续,也具有韧性与活力。

(据《经济日报》)

保持历史耐心 方能行稳致远

□段蕾

谋长久者方行稳,有耐心者能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保持历史耐心”,深刻指出“要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困难虽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既要谋长远,又要干在当下”。历史耐心如同“稳定锚”“定盘星”,让我们在攻坚克难的实践中始终锚定目标、奋勇前进。当前,中国式现代化进入关键推进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党员干部干好工作,尤其需要保持历史耐心。

历史耐心是一种以长时段视角审视事业发展的时间观和事业观,体现为对历史规律的清醒把握,久久为功的战略定力,立足长远、厚植根基的责任担当。唯有保持历史耐心,才能避免急功近成、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确保事业发展不偏航、不走样。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热衷于打造吸引眼球的“形象工程”,把精力集中于看得见、易出彩的工作上,对改善营商环境、保护生态环境等基础性、长远性工作不重视;有的在面对乡村全面振兴等长期任务时心浮气躁,遇到一点困难就退缩到底。这些都是缺乏历史耐心的表现,不利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缺乏历史耐心,根子在于对政绩和潜绩关系的认识出了偏差。潜绩是显绩的基础,显绩是潜绩的结果,二者辩证统一。党员干部要想出政绩无厚非,但若一味追求立竿见影、光鲜亮丽的显绩,不做夯基垒台的潜绩,那么显绩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做好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才能真正造福于民。从这个意义上说,潜绩就是最大的显绩。党员干部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显绩与潜绩的关系,既不贪一时之名、一时之利,也不因一时挫折动摇信心,而要以长远眼光和高度历史责任感多做固根本、培后劲的工作,让政绩既惠及当下,又泽被后世。

历史耐心建立在对历史规律和实际情况的科学把握之上。20多年前,浙江广大农村普遍面临“成长的烦恼”,虽然经济发展迅速,但乡村建设仍存在较大短板。面对难题,浙江持续深入实施“千万工程”,因地制宜、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城乡融合发展的规律,从农村建设切入,推进到产业培育、乡风建设,由点及面、迭代升级,循序渐进久久为功,不断绘就现代乡村新图景。浙江乡村蝶变的实践证明,只有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才能善作善成。这深刻启示我们,无论推进何种工作,都要牢记“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既以大历史观照现实,谋划未来,避免割裂历史的短视行为,又要立足当下实际找准发展路径,让长远目标落地于具体实践。

保持历史耐心,并不意味着凡事都不着急、慢慢来,而是要把握好快与慢、先与后的关系,在辩证施策中提升工作质效。比如,雄安新区设立之初,面对“千年大计”的历史重任,建设者们没有急于动土,而是注重“留白蓄力”,开展全域地质勘测、编制顶层规划,把每一寸土地都规划得清清楚楚后再开工建设。蓝图一旦绘就便顺势生长:“四纵三横”路网快速延展,首批疏解企业进驻,地下、地上、云上“三城”同步发展。雄安新区的建设,生动阐释了谋定而后动、功成而后的辩证统一。党员干部既要涵养“十年磨一剑”的韧劲,保持战略定力,又要保持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确保执行效率。根据工作性质和实际情况,合理把握节奏、精准施策,让快有快的道理,慢有慢的价值,实现快与慢的相得益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一种历史的纵深感来把握现在做的事情和制定我们的目标,就做不好今天的工作。”历史耐心,既蕴含“等不得也急不得”的思维方法,也蕴含“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的自信精神。在“致广大”中把握历史规律,锚定长远目标,在“尽精微”中破解现实难题、做好当下工作,才能在乱云飞渡中推动伟大事业行稳致远。

(据《人民日报》)